

# 乾隆皇帝的文殊·宗喀巴自覺與形塑

曾淑娟

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

乾隆皇帝—這一位中國帝制歷史四千多年來壽享最長，執政最久的傑出帝王，十八世紀中國顛峰盛世創造的靈魂人物。清史學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從文藝風雅的視角評論乾隆皇帝具有「超越別人，優於別人」的人格特質，實為真知灼見，即使在這難於自我掌握的生命、天命變數，他都鮮明的表現了這種「超越別人，優於別人」的人格特質。

一般人透過傳統以儒家為本位的史觀來認識他，都知道他是一位深受儒學薰陶，承襲「內聖外王」統治意識的聖明天子，卻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深受佛學潛移默化，力行「轉輪聖王」政治思想的轉輪佛王。乾隆皇帝的天章采文之中對於佛家經論的引述屢見不鮮，例如：

〈萬壽山多寶佛塔頌〉之  
佛前七寶塔，高五百由旬。  
湧出虛空中，種種寶莊校。  
多摩羅跋香，天曼陀羅華。  
以是為供養，時出大音聲。  
讚嘆佛妙法，人天千萬億。……

〈普寧寺碑文〉之  
肖彼須彌山，巍閣凡三層。  
日月在兩肩，地金水輪風。  
其內小鐵圍，大成海水滿。……

〈御製清文繙譯大藏經序〉之  
夫以禍福趨避教人，非佛之第一義諦也。第一義諦佛且本無，而況於禍福乎？但眾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故以因緣禍福引之由漸入深而已。

由文中乾隆皇帝對佛教典故、宇宙觀、教義的敘述論說，也無形中表露了他的佛學造詣之高與佛法修養之深。

乾隆皇帝之所以能夠締造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帝國，其實與他的藏傳佛教（喇嘛教）信仰修行與政策運作，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乾隆皇帝以儒、佛融合之獨特的統治意識，以聖王、佛王的雙面風貌，有效的管轄統治著中原廣大的漢族地區與少數民族的邊疆地區；相對的，此幅員遼闊內的各民族成員也都生活安定，和諧融洽，而真心的認同服膺，使得這個統一多民族的

國家在他的治理之下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而他也開創出歷史的新局；他所開啟「族群」的論題，亦因此而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成立提供了政治基礎。乾隆皇帝開創中國成為一幅員遼闊，多民族和諧融洽的統一國家，其政治智慧與統治意識就反映在乾隆皇帝的「文殊·宗喀巴」自覺與形塑。

清朝的統治者，原本是出身於信奉薩滿教的「叢爾小夷」、「看邊異族」。十五世紀時期，其先祖努爾哈赤憑藉著雄才大略興起於白山黑水間，而與大明、蒙古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很快的，努爾哈赤運用了藏傳佛教、聯姻等政策，吸收了文化背景相似的漠南蒙古作為後盾，而將局面調整為滿、蒙聯盟與大明二分天下的對峙時勢。西元 1638 年，皇太極興建於盛京的首座藏傳佛教寺院「實勝寺」落成，寺前樹立了滿、漢、蒙、藏四種文體的碑文，這可能是清帝使用四體文字並行最早的開始，它象徵了滿洲皇帝多民族融合的政治理想，也反映了滿洲皇帝要繼續擴大滿、蒙聯盟為滿、蒙、藏，以入主漢人之中國大統的政治雄心。深具外交才華的西藏黃教領袖五世達賴喇嘛慧眼獨具，洞察了清帝的雄心大志，而運用藏傳佛教菩薩王思想，宣揚滿、藏、蒙的君主分別是「三怙主」—文殊、觀世音、金剛手三位菩薩化身的轉輪王，編造了清帝即是「文殊·皇帝」的神話，與滿洲皇帝的滿、蒙、藏聯盟，互為呼應，使得滿、蒙、藏因而緊密的結合起來。而黃教始祖宗喀巴不但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亦是三怙主總集化身的神話，又更加親密了清帝與黃教之間的關係。西元 1644 年，清帝如願以償的入主中原華夏，黃教也雀屏中選成為清廷唯一扶植的教派，並成為清帝信仰的對象。康熙皇帝時期，漠北蒙古在黃教領袖哲布尊丹巴的領導之下，全部族悉皆歸附於大清版圖之內，這是清廷一貫實行黃教政策多所斬獲，成功的一面。然而，美中不足的，漠西蒙古準噶爾挾持著宗喀巴黃教的威神力，始終另立政權，而對清廷時有挑釁。康雍兩朝，清廷與準噶爾的戰爭已斷斷續續的進行了半個世紀之久，這場戰爭涉及到西北、北部與西南廣大邊疆地區的安定和統一，關係重大，清廷投入了極大的兵

力與財力，但是僅能阻遏準噶爾的入侵，卻不能深入作戰，犁庭掃穴，獲取全勝，給了乾隆皇帝反思。放在蒙藏文化圈之天平秤上的「文殊·皇帝」政權，與「文殊·宗喀巴」神權，似乎是不能平衡的，甚至是略遜一籌的。如何解除「文殊·宗喀巴」神權的魔咒，突破漠西蒙古的封鎖線，徹底征服「數世梗化」為患清廷長達百餘年的準噶爾，考驗著乾隆皇帝的政治智慧。

乾隆十年，乾隆皇帝秘密的從章嘉國師接受了無上密法的灌頂，開始了各種「本尊瑜珈」、「即身成佛」的密法的修行。日復一日，乾隆皇帝在〈上師瑜珈法〉中，藉由「文殊·宗喀巴」的本尊觀，其精神、形體均與「文殊·宗喀巴」融合為一，真實而深刻的體驗與「文殊·宗喀巴」無二無別的神妙意境，因而一再的從潛意識中去佛化自己，「我就是文殊·宗喀巴，文殊·宗喀巴就是我」。他開始察覺到，在現實世界中的自己也可以是「文殊·宗喀巴」。他終於領悟了「文殊·宗喀巴」的妙用，也知道要如何妙用「文殊·宗喀巴」。乾隆皇帝把「文殊·皇帝」與「文殊·宗喀巴」兩個神話融合為一，並在自己身上成為此神話的真實。於是，十八世紀一場「乾隆·文殊·宗喀巴」的「造佛運動」就此展開了。

乾隆皇帝的「造佛運動」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構一個蒙藏文化圈最能認同接受之「佛」象徵符號。乾隆皇帝根據〈宗喀巴上師瑜珈法〉的教法義理，〈宗喀巴上師資糧田〉的觀想圖像，以及《上師供養法》的唸誦儀軌文，繪製了一系列呈現藏傳佛教曼陀羅式唐卡風格的〈乾隆皇帝喇嘛像〉畫像。在畫像中，他挪用了「文殊·宗喀巴」的圖像特徵—喇嘛僧相、戴黃色帽，雙手呈說法印、禪定印，持智慧劍、般若經，來建構自己的肖像。一系列的〈乾隆皇帝喇嘛像〉就懸掛在帝國最重要的藏傳佛教中心—雍和宮、普寧寺、普樂寺、須彌福壽之廟等喇嘛廟，讓往來於此之蒙藏政教高層的喇嘛、王公、貴族們瞻仰膜拜。

在歷史脈絡之中，乾隆皇帝的「文殊·宗喀巴」形塑對於我國疆域版圖幅員遼闊的奠定，多民族和諧國家統一的完成，實具有前瞻性、開創性的意義。〈乾隆皇帝喇嘛像〉中乾隆皇帝的肖像採用了以「喇嘛相」呈現，塑造了蒙藏文化圈最崇高的「文殊·宗喀巴」的喇嘛形象，使自己神聖化，並在黃教的共同信仰基礎上，透過「文殊·宗喀巴」形象激發蒙藏人民賦予自己最大的權威。這是乾隆皇帝深刻的領悟到，要完成「祖宗未竟之緒」，征服如芒刺在背的準噶爾，統治以「喇嘛中心」為主義，教權在政權之上的

蒙藏民族，唯有清帝自己形塑「文殊·宗喀巴」的「喇嘛相」，登上藏傳佛教金字塔端宗喀巴的位置，將宗喀巴的神權也掌握在清帝手中，才是治理蒙藏釜底抽薪的根本之道，也才有可能征服準噶爾，確保邊疆地區的長治久安，並真正的完成國家的整合—統一與各民族的和平融洽。這是乾隆皇帝在開創中國歷史上最大版圖，締造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時代背景之下，欲使大清與蒙藏的關係不僅是建立在帝國的君臣體系之中，而且是充滿了宗教情感，同時，亦可破解在宗喀巴神權之下，蒙藏政教領袖習於依附宗喀巴之象徵符號，而與清廷對抗圖謀自己利益的魔咒，進而又可使蒙藏人民視乾隆皇帝為政教合一「法王、人王」兼具的佛王，一心歸向大清帝國，所展現「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政治智慧與統治意識。

在人性心理之中，乾隆皇帝真心虔誠信仰藏傳佛教，以藏傳佛教為唯一皈依，接受灌頂，修行密法，有希冀「即身成佛」以達到生命永恆的神聖意義。作為統治者的乾隆皇帝，利用藏傳佛教作為達到伸張政權的手段，這是它加強統治的需要，並且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同樣的，尋求宗教信仰是人類本自具有的心理和天性，乾隆皇帝作為個人，對宗教有自己的信仰向度。乾隆皇帝作為格魯派的密法修行者，修習了〈宗喀巴上師瑜珈法〉，而〈宗喀巴上師瑜珈法〉所強調的精神，就是要把自己觀想為本尊宗喀巴的形象，最終要與宗喀巴融為一體，以宗喀巴作為神聖偶像與成佛標的。乾隆皇帝日復一日的在修行〈宗喀巴上師瑜珈法〉中，透過「文殊·宗喀巴」本尊觀的儀式，產生了「文殊·宗喀巴」的崇拜，也產生了「文殊·宗喀巴」的自覺，在本尊觀的儀式中，他體驗到自己是「文殊·宗喀巴」本身，同時也是宇宙唯一的存在，是至高無上的意識；他體驗到了超越二元對立的統一，觀者與被觀者，崇拜者與被崇拜者已融合為一，而重構了自己是「乾隆·文殊·宗喀巴」的意象。乾隆皇帝對藏傳佛教信仰之誠，藏傳佛教推展之廣，一千多年來的中國帝王無人能出其左右，Patricia Berger 賦予乾隆皇帝所締造的偉大帝國為「空性帝國」，誠是實至名歸；「空性帝國」就是在他的「文殊·宗喀巴」自覺，他的「乾隆·文殊·宗喀巴」自我認同以及自我崇拜心理下締造出來的。

乾隆時期，蒙藏政教領袖紛紛臣服歸向重大歷史事件，見證了蒙藏人民接受「乾隆·文殊·宗喀巴」的這一個事實，其中以黃教領袖達賴喇嘛之供奉〈乾隆皇帝喇嘛像〉最具代表性。乾隆晚期，八世達賴喇嘛即開始於布達拉宮供奉〈乾隆皇帝喇

嘛像>，作為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以及攝政活佛等噶廈政府僧俗官員定期、不定期的膜拜頂禮，以表示他對「乾隆·文殊·宗喀巴」的臣服歸向。更重要的是，此後，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之轉世靈童都必須在布達拉宮的〈乾隆皇帝喇嘛像〉前舉行金瓶掣籤儀式，之後，報請皇帝批准冊封，方可坐床，正式繼位，這顯示了乾隆皇帝對於西藏兩位最大的活佛具有最後認定的裁決權，對於西藏最高的宗教領袖具有最終安排的人事權。也就是說，乾隆皇帝以「乾隆·文殊·宗喀巴」的面貌將蒙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提高到中央層級，使自己成為法定之政教合一的最高領袖。同時，這也是代表了蒙藏人民接受認同「乾隆·文殊·宗喀巴」，而把最終極的宗教領袖人事安排權力，都願意釋放出來，交到乾隆皇帝手中。

另一方面，就宗教方面，乾隆皇帝最終是否也以「文殊·宗喀巴」作為本尊，達成了他「即身成佛」的理想，筆者乃一介凡夫，無能探究此心性之事，不過，還是可以從他臨終前的生命跡象觀察出一些蛛絲馬跡。

《清實錄》記載，乾隆皇帝崩逝的前一日仍然是神志清明的，雖自知大限已至，卻還無所畏懼，視死如歸的寫下了遺誥說：

自古帝王躬享遐齡，史冊相望，終歸有盡，且人生上壽百年，今朕已登八十有九，即滿許期頤，亦瞬息間事。朕惟莊敬自強修身以俟，豈尚有不足而奢望無已耶。朕體氣素強，從無疾病，上年冬臘，偶感風寒，調理就愈，精力稍不如前，新歲正旦，猶御乾清宮受賀。日來飲食漸減，視聽不能如常，老態頓增，皇帝孝養盡誠，百方調護，以冀痊可第。朕年壽已高，恐非醫藥所能奏效，茲殆將大漸，……。

一般而言，人都是貪生怕死的，視死亡為畏途，更何況乾隆皇帝位居九五之尊，富有天下，大權在握，而在面對死神召喚之時，卻能如此的毫無貪戀，無所畏懼，要是沒有佛家所謂的「修行」，相信是無法做到的。特別是，他又以近九十的高齡，能如此神志清明的微恙示寂，中國歷史上致力於以佛法修身、治國的帝王不少，而真正能在生命樂章的最後，譜上如此完美的休止符，恐怕也只有乾隆皇帝一個人了。相對於有「菩薩皇帝」之稱的梁武帝，最後卻憂憤成疾，抱憾餓死於侯景之亂，史載：

上（梁武帝）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憂憤成疾。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

留下了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一樣的淒涼悲愴。比較之下，更顯得乾隆皇帝「文殊·宗喀巴」的本尊觀修行，確實有某種程度的「修行」。

乾隆皇帝駕崩於十八世紀的最末一年的正月初三日，並於九月十五日安葬長眠於裕陵—他自己的佛國淨土。裕陵地宮濃郁的藏傳佛教氛圍，象徵著他在生命最後時刻—臨終、中陰，或是下一個生命的轉生，仍然堅持著以藏傳佛教實現「成佛」的生命理想，他最終歸宿的佛國淨土，並不在他處，而是自己成佛所創造的佛國淨土。不論是「即生成佛」、「中陰成佛」或「轉生成佛」。他有沒有達到十全十美，實現成佛的理想不得而知，然而，卻可以看到他以藏傳佛教作為實現成佛理想的最後堅持。

在歷史理解中，現在與過去一向是糾纏不清的，歷史做為一種智性活動也可在現代得到新的可能和活力。十八世紀的乾隆皇帝與我們相隔了二百多年，他的身影形骸如今或許早已灰飛湮滅了，但是他並沒有真正的消失在這世界上。他似乎仍然鮮活在二十一世紀人們的生活周遭之中，一樣深刻的影響著人類的心靈。乾隆皇帝一生所傾心經營的精神文明與藝術文化—清宮、外八廟、裕陵等建設以及其中的收藏品，不但留下了他個人在文物創作方面最高成就的歷史見證，並且為世界人類留下了一大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其中以清宮最為矚目，其受人矚目的焦點之一就是，它尚保持著乾隆年間完整原狀的皇家佛堂—雨花閣、梵華樓、養心殿西暖閣等十餘處，並且收藏著乾隆時期各種的藏傳佛教文物—造像、唐卡、法器、佛經等數萬件之多，每天吸引了來自全世界數萬人的觀賞。除此之外，清宮乾隆時期的文物也被中國大陸以外的全世界各大博物館收藏展出，本文所採用的〈乾隆皇帝喇嘛像〉即是美國 Freer Gallery 的展覽品，而臺灣也曾分別於 1967 年、1999 年、2002 年舉辦過藏傳佛教法器特展、承德避暑山莊藏傳佛教文物特展、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等。如果說，乾隆皇帝站在十八世紀的最前列，運籌帷幄，叱吒風雲，在他的巨大身影下，翻過了一頁又一頁的歷史篇章，他的所思、所言、所行深刻的影響著那個時代。同樣的，從藝術文化珍品可以撫慰人類心靈，提升人民素養，締造高尚社會的這個視野，乾隆皇帝也以他所創作的精神文物深刻的影響著他身後的這個時代。就此而言，他應是超越了「時空的極限」，達到了宗教信仰的最高層次—超越性的生命永恆。